

该对其进行监督,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促其很好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问责除了具有责任追究的惩罚性功能外,还应有对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质询、监督、过问的功能。”<sup>[5]</sup>公众积极参与能够有效地提高问责的质量。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初往往公众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淡出公众视线,这同样也极易造成公众对问责和责任人所应承担责任的遗忘。因此,适度引导公众关注和参与非常必要。

## 结 语

基于利益相关者模型的突发公共事件问责机制构建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基于我国国情还有一定的非适应性和非契合性。这种非适应性和非契合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历史的传统文化,不同的人文特色和环境,不同的政治特点和环境,不同的地域文化,甚至包括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不能盲目照搬这种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其复杂特殊性。

首先,将利益相关者模型应用于突发公共事件问责机制构建的最大意义在于,明确甄别责任,使责任与利益挂钩,更加有利于提高问责效率,提升公共管理质量。利益相关者原则一方面使相关责任人都得到合理适度问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使他们都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所在,在日常的工作中多加防范,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这里要特别强调作为影响者的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问责机制构建中的重大责任。新媒体传递真实、准确和公正的信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问责机制起到正面的作用,推动问责制的发展,提高问责制的效率,有利于突发公共事件快速解决。因此,需要正确引导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问责机制中发挥正能量,正确地进行舆论引导,尊重事实,探求真相,恪守职业道德,秉承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传递准确的公共信息。一方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及时、客观和公正的报道,使公众获得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精准的判断,减少主观臆测,能够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对问责

的过程进行如实报道,有助于政府和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对问责进行正面推动,有助于解决问题,提高管理效率。

其次,必须明确问责的外在表现是惩戒,真实目的却是预防。“从政府制度化管理的视角看,惩罚机制会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从政府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惩罚机制会产生相反的作用。”<sup>[6]</sup>此外,要特别强调,问责是否合理适度至关重要。问责适度合理则有利于加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高危机管理效率;问责有失偏差则会降低政府危机管理能力,降低危机管理效率。

随着问责机制的构建,未来要特别注意甄别直接问责和间接问责,问责所承担的实际责任和形式责任,还要注意区分责任人的故意和非故意。未来,还要制定更加规范完善的问责法律体系、制度规范和问责程序,使政府和公众中在问责过程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减少问责的主观随意性,使问责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 注释:

[1]《“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2015年1月21日, <http://news.sohu.com/20150121/n407959650.shtml>, 2015年3月16日。

[2]爱德华·弗里曼等著:《利益相关理论现状与展望》,盛亚、李华清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50—154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共产党人》2014年第20期。

[4]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117页。

[5]马怀德、周慧:《问责观念转变与突发事件问责——基于突发事件应对的视角》,《中国应急管理》2011年第2期。

[6]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理念探讨及模式分析》,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23页。

# 如何科学界定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

文/许峰

**摘要：**客观评价一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是看一国综合实力的高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为国际地位提升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从总体上看，国际上对于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共识之外也存在一种高估中国国际地位的倾向。基于当代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以及全球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现实国情，当代中国国际地位可概括为“当今世界体量最大、国力增长速度最快、国际地位最为凸显的发展中大国”。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发展中大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6-0101-05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抬升，如何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怎样有效应对我国面临的日渐增大的外部干扰与阻力？怎样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花样翻新的“威胁论”“崩溃论”“责任论”？只有清晰界定出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我们才能针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应。显然，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一 确立评价国际地位的主要标准和原则

(一) 客观评价一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是看一国综合国力的高低。综合国力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力总和，而国际地位则是一国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外在集中表现，可以说二者互为表里。就综合国力而言，一般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硬实力是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一般可以量化和统计。国际政治中的“大棒”和“胡萝卜”一般可以归于硬实力的范畴。软实力表现为政治吸引力、国家凝聚力与国家形象、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公民素质等方面。软实力主要是通过采用吸引或说服而非强制或收买，从而影响他人意志和行为的方式。

硬实力和软实力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影响程度，但是两者对于评价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均有着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硬实力是软实力的物质基础。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等为获得国家政治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国际话语权、公民素质提升等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空间，从而使一国的软实力具备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反之，软实力因素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研究”（14BKS070）

**作者简介：**许峰，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市，100101。

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一些在国际上滥用软实力的国家会变得日益孤立,逐渐失去国际认同和民众拥护,消减了硬实力的发挥空间,导致硬实力归于失效,从而使得一国国际地位下降。因此,在评价一国国际地位时,既要看其硬实力,也要看其软实力,还要注重一国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软、硬实力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则必定有利于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反之,二者相互干扰、相互牵制则会削减其综合国力,使其国际地位下降。

(二) 关于评价原则与方法论问题。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一要运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评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除了需要考察该国综合国力,还要考虑特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形成的国际格局,以及作为主要参照系的一些国家的实力与地位的此消彼长。由于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作为主要参照系的某些特定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准确把握这个变化过程以及发展趋势才能使评价做到公正客观。此外,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要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和分析,才能从变化过程以及趋势上把握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动前景和内在动因。二要坚持比较的原则。要将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我国其他时期的地位进行纵向比较,还要与主要参照系的一些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要看中国人对本国国际地位的认识,也要看外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既要看综合国力的总量指标比较,也要看各方面的人均指标的比较。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脱离具体国情。要从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国际地位的出发点。如GDP总量在衡量一国国际地位时是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一指标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综合国力中的“长项”,也要看到“短板”,切忌“盲人摸象”或“晕轮效应”。

## 二 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获得了显著提升

### (一) 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影响力震撼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为国际地位提升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国内生产总值是代表一个国家经济

实力的指标。1978年,我国GDP为2164亿美元,居世界第十。2014年我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近46倍,居世界第二。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9.7%,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此外,中国经济创下的其他“第一”,如外汇储备、货物贸易、制造业总量以及钢、煤、水泥、棉布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也足以让世界震撼。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如果与美国这一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相比,2000—2011年,中国进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由3.35%增至9.94%,而美国则从18.73%下降至12.32%;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进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13.03%,而美国为8.63%,中国贡献相当于美国贡献的1.51倍。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14.02%,而美国为5.94%,中国贡献相当于美国贡献的2.36倍。<sup>[1]</sup>2008年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国实力是一次极大的考验,而中国的表现无疑最为出彩。危机爆发后,中国审时度势,推出了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经济率先恢复,并拉动了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稳定了发达国家的政局,极大地增强了众多国家走出危机的信心。就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2008年达到50%以上,2009年至2014年则一直稳定在30%左右,居世界首位。据测算,2014年至2020年,中国累计向国外提供的商机将达1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1.2万亿美元,将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达到27%。<sup>[2]</sup>基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发动机的“中国地位”得以确立。

(二)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国际话语权日益增强,在国际问题上的议程设置能力、引

领动员能力以及斡旋运筹能力等方面有长足进步,逐渐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合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世所公认,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在应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防范金融危机、防止生态破坏,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G20中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使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合理方向发展。中国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回应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就“一带一路”而言,目前已有沿线64个欧亚国家响应参与,而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在国际上获得超出预期的响应,被国外媒体视为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新标志。总之,当代中国不再是置身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旁观者或疏离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甚至是引领者,在当今国际上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中都不难看到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如德国外交政策组织研究所所长艾波哈德·桑施耐德所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北京的参与,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sup>[3]</sup>

(三) 中国在科技、军事以及文化的国际影响持续增长。

在科技方面,中国的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一大批如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等在世界上享有盛誉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而言,我国科技在国际上处于“三跑并存”格局,相当一部分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还有不少领域正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中国政府经提出在201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GDP的2.2%;到2020年实现占GDP2.5%,为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

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军事上,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作为核大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声明不首先使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军事力量增强意味着捍卫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军事影响力的正义性与一些国家把军力当成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棒”有着本质不同。在文化方面,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与97个国家签订了800多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进行文化交往,并在海外82个国家设有96个使领馆文化处。中国在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全世界的86%人口)建立了350多所孔子学院,还有数量众多的孔子课堂。中国与许多国家相互举办了“国家年”“文化年”“语言年”“旅游年”“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博览会”“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等各类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文化热”在世界各地持续升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汉语,阅读中国书籍,观看中国影视剧、听中国故事、品尝中国美食、练习中国功夫蔚然成风,至于中国制造的商品更是无处不在。

(四) 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不断向世界释放正能量

数十年来,中国在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体制转型、应对经济全球化、应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与危机、国际减贫等诸多方面在国际上堪称典范。中国道路蕴含的极为丰富的渗入式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如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外媒就此评价:“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穆斯林,各国政府正在中国的大门前排起长队,等待学习新本领”;“从委内瑞拉到越南,中国模式的吸引力随处可见。”<sup>[4]</sup>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sup>[5]</sup>

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学术

界和媒体开始热议“中国模式”，此类理论著述、学术研讨、访谈和演讲等层出不穷，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西方政界、学术界以及媒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模式”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或效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至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多次谈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发展高铁、建设现代化机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机构以及世界上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中国的基础教育、清洁能源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发展制造业以及扩大就业方面比美国的行动更为迅速。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表示，中国的持续成功发展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西方学界和政界不少人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做法，而且关注点从一些具体措施逐步拓展到中国的制度因素和文化观念。近些年来，西方无论政界还是舆论中“向中国学习”的声音日渐增多，这反映出中国发展道路在西方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 三 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国力 来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

从总体上，国际上对于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共识之外也存在一种高估中国地位的倾向，诸如“中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统治世界”“2015中国世纪元年”“超级中国”等。以这些论断为基础，很容易得出中国已是或即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结论。这显然与中国实际不符，也是一种很不严谨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判断，除了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角度等原因以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评价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由这一国情所决定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

2014年4月，世界银行赞助的国际比较项目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今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随之一些外媒质疑，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了，还是发展中国家吗？有的则认为，中国是想逃避国际责任，所以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愿意承认“世

界第一经济体”的位置。其实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大国，这一身份以及地位一直是国际公认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一些人士开始拿中国的经济总量来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并要求中国承担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否则，就给中国戴上一顶“不负责任”的帽子。

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二，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甚至还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特征没有变。

一是人口多。中国有13.6亿人口，目前每年净增加约700万，放开单独二胎后，每年人口增长为20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人，城乡低保人口7400多万人，残疾人8500多万，还有差不多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全国每年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隐藏着难以统计的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二是底子薄。改革开放后，中国总家底厚实了很多，但问题是这些家底除以13亿之后就摊薄了。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不到美国人均GDP的13%、日本的16%，甚至是俄罗斯的42%，巴西的54%。2013年国民人均收入排名在世界第94位。从主要自然资源家底看，中国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世界上名列121位。中国人均耕地仅1.35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我们还有近700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0.8亩的国际警戒线以下。煤炭资源人均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除了上述基本资源以外，还有很多资源人均数都处于世界后列。从人均社会资源方面看，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但这种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在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人均公共支出甚至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三是发展不均衡。从发展阶段看，我们还

处于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都非常大，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还相当落后。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改革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之多、面临的现实问题之难、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之艰巨、所处国际环境之复杂都是举世罕见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3月19日接见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感慨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的确，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我常说，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sup>[6]</sup> 尽管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但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离一些世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不能因为国力快速提升就忽视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从而否认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日在欧洲布鲁日学院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中央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国际地位问题上的判断是一致的。

评价中国国际地位还要注意避免一些不良倾向。第一，避免标准单一化。不能只看经济总量就作出判断。经济总量是国家实力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并不能就此得出综合实力第二的结论。国内外有些学者直接将经济实力等同于国际地位的观点是不严谨的。第二，避免评价绝对化。“中国世纪论”或“中国统治世界论”等观点，虽然看到了中国在21世纪强势崛起以及国际影

响力不断扩大的事实，但这些观点无形之中拔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片面认识。总之，应该立体化地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是单向度地评价，更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的评价方法。

总而言之，国际地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反映国家发展总体状况的一面镜子。衡量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进行动态、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既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充分肯定我国国际地位快速提升这一主要特征，但也不可脱离全球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现实国情。基于此，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那就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体量最大、国力增长速度最快、国际地位最为凸显的发展中大国。

#### 注释：

[1] 《中国贡献，和平发展正能量》，《人民日报》2012年11月6日，第5版。

[2] 《“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国家创造发展新机遇》，新华网，2015年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10/c\\_11113948775.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10/c_11113948775.htm)，2015年9月30日。

[3] 艾波哈德·桑施耐德：《没有北京的参与任何国际问题都无法解决》，《奥地利邮报》2008年3月25日。

[4] 转引自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

[5] 《如重新选择 阿富汗将走中国道路》，《环球时报》2014年6月10日。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19日接见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新华网，2013年3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20/c\\_12447870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20/c_124478704.htm)，2015年9月25日。

责任编辑 顾伟伟